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WAI GUO XUE ZHE
PING MAO ZE DONG

第二卷



从奠基者到

红太阳

萧延中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二卷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萧延中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2783/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2卷: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
萧延中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08-1908-0

I. 外… II. 萧… III. 毛泽东-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74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7-021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40 千字
印张:	14.375
印数:	8095~11094 册 (平)
定价:	20.00 元 (平)

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诸位专家在审读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会

顾 问：廖盖隆 林茂生 李君如

主 编：萧延中

副主编：王应一 何祚康 张惠才

杨 德 唐秀兰

目 录

第三章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宏观透视	(1)
导言.....	(1)
简评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3)
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日〕竹内实	(19)
毛泽东：一位需要公正评价的历史巨人	
.....〔美〕迪克·威尔逊	(22)
毛泽东的肖像.....〔美〕R. 特里尔	(31)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美〕弗朗西斯·苏	(48)
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日〕井上清	(56)
毛泽东的成就与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美〕墨子刻	(58)
简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加拿大〕陈志让	(63)
我看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70)
美日学者对谈录——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	
的讨论.....〔美〕本杰明·史华兹 〔日〕中嶋岭雄	(78)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日〕野村浩一	(88)
关于毛泽东思想性质与分期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102)
第四章 毛泽东政治权威的起源、依据和功能	(118)

导言·····	(118)
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 ·····〔美〕弗里德里克·泰韦斯	(121)
是党的领袖还是“天子”——论毛泽东个人权力 的基础和意义·····〔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165)
论毛泽东的权力、权威及合法性概念 ·····〔印度〕莱恩·N. 夏梅	(180)
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 ·····〔美〕雷蒙德·怀利	(186)
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美〕本杰明·杨	(211)
从革命奠基者到“红太阳”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222)
第五章 毛泽东个人及社会的心理分析·····	(251)
导言·····	(251)
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美〕卢西恩·派伊	(253)
革命领袖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 ·····〔美〕理查德·索罗门	(264)
〔附1〕毛泽东：其人及其象征 ·····〔美〕厄洛尔·迪特默	(275)
〔附2〕美国汉学界中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 概念·····〔苏〕Y. 耶基莫娃	(284)
第六章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303)
导言·····	(303)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 的地位·····〔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306)
简论文化大革命·····〔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316)
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	

透视·····	〔美〕本杰明·史华兹 (329)
历史与意志·····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350)
文化革命的概念·····	〔美〕莫里斯·迈斯纳 (381)
文化大革命的再评价·····	〔美〕卢西恩·派伊 (404)
从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实行革命性变革 的谋略·····	〔美〕李鸿运 (422)
〔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徐友渔 (434)

第三章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宏观透视

导 言

本章各文的作者均为著名学者和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同时都发表过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著作。施拉姆是中国学术界最为熟悉的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著名专家，他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早有中译本在中国流传，其重要论文绝大部分也被收录到中文版《施拉姆集》之中。竹内实则以编辑《毛泽东集》（十卷本）和《毛泽东补集》（十卷本）而闻名于国际毛泽东思想研究界。该书所收毛泽东文稿均以最初版为蓝本，对解放后版本的修改之处一一予以对照和注明。这种对照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它不仅为读者节省了不少阅读时间，而且使读者极为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演化轨迹。井上清是当代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两大卷的代表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衰》，是当代世界史和日本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参考书。有意思的是，他是成立于60年代中期的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晚年他仍坚信毛泽东思想具有经久不衰的永恒意义。加拿大籍的华裔著名学者陈志让是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开拓性人物之一。196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以及在翻译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方面的较深造诣，使他对西方毛泽东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还著有《中国与东亚社会史》、《袁世凯》、《军绅政权》等书，以及关于义和团、共产主义运动和经济史方面的多种论文。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之一，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其一系列专著，如《严复与西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论五四运动》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都已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1952年他与老师费正清等一起最早提出“毛主义”概念，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墨子刻则是美国中国思想史专家，其名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以论证中国思想的连续性而被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引证。本书中，他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固有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与思想的重要途径。最后，特里尔和威尔逊是两部著名的《毛泽东传》的作者。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是夹叙夹议的“传记”，但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则迥然有别，其中好、恶、褒、贬均不尽相同。

鉴于上述专家的大部分著作均已中有译本，这里或收录其著名的“导言”及“结论”部分，或收入其散论的文章，以为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读者导引线索，提供参考。

简评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20 世纪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评价。40 年代，许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宫）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 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党国家的统治者。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人们（特别是西方的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富有灵性的圣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另一看法开始占上风：恰恰相反，他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模型铸造的一个严厉、专断的暴君。

毛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还兼有其他。人们常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从俄国经验汲取一些可以类比的词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解释的话，更恰当的应该是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

他本人虽然没有缔造中国共产党，但他为夺取政权最终制定了策略，他领导党走向胜利，从这个意义上，他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列宁。他也完成了斯大林那样模棱两可的作用：斯大林不仅领导了农业合作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通过他摧毁党内竞争者的方式使整个事业濒于崩溃。此外，从非常现实的意义

来说，他是中国的彼得大帝：他是试图吸引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使国家现代化的第一个统治者，而无论是在帝国覆灭之前还是之后，他的历届前任都未像他这样做。

甚至在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之前，彼得的民族复兴目标就吸引了他。因此，我们必须从他生平事业的这方面谈起。用一两段文字是不足以说明 19 世纪末中国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的。但是不涉及这些问题就不能理解毛本人和他的政治搏斗。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在几十年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看来它不仅威胁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中国的完整，而且也威胁着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与文明本身同样长久的民族遗产的生存。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统治阶层最初的反应是企图只利用西方技术的成果，特别是现代武器抗击外国人并扑灭国内反叛，而在同时保持中国无与伦比的“道”完好无损。一代人之后，1893 年毛泽东在湖南省诞生。当时，对西方的机器和西方的知识，门户敞开得稍大了一些——只要这些新学被牢牢地置于适当的位置。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以后的生平年代里，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把中国革命的开端定为 19 世纪末。这既是因为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因为它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出现。

这些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是重要的，但是受西方影响而造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全部进程是更为广阔、更为意义深远的。其结果是，14 岁的少年毛泽东在阅读第一本政治小册子时，帝制及其支柱孔子的思想就已经受到猛烈的动摇和怀疑，希望把它改良得面目全非，成为欧洲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人和希望彻底破除它的革命者正在辩论。四年后，1911 年秋，在一致的但比较有节制的数省的起义面前，摇摇欲坠的帝国最终垮台。在这些省份中，毛的故乡湖南是第二个起义的省，毛得以从军保卫新

的共和国。

虽然毛这次从军只有半年时间，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不断对武德大为赞美，而从事战争则成了他中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的生活方式。

毛成熟前后的条件是1915年出现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企图摒弃中国传统中一切旧的、过时的和腐朽的东西，而代之以大部分是从西方汲取的新的、新鲜的和有生命力的思想。但是，虽然在“打倒孔家店”这个否定的目标上易于取得一致，但在对未来道路肯定的选择上，这个“新思潮”的党很快就分裂了。当时的条件加剧了这种不和。欧洲列强因为技术先进和军事强大而受到尊敬，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肆意杀戮并没有增加他们在道义上的威信。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很快就作为也许更适合亚洲条件的取代模式而在中国引起注意。巴黎和会决定把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也促成了对西方幻想的破灭，并招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学生示威。这个激烈和决定性变革的时期得名于此，现在通常被称为“五四”时代。

两年之后，知识分子和佼佼者两极分化加速发展的进程导致了1921年6月^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毛当时已经作为报纸撰稿人和1919年夏天在长沙（湖南省会）的政治组织者而小有名气，在那时之前的五年中，他在长沙一所师范学校受到了中学和西学的良好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两年中，毛泽东对湖南省工会运动负总责。作为对莫斯科命令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议定了一种同盟的形式（包括它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

^① 原文如此，应为7月。——译者

后，从1923年至1926年，毛在国民党的几个组织中积极工作。从他的未来来看，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6年5月到9月，他领导了讲习所。9月，作为讲习所主办的一组文章之一，他发表了一篇文章^①，以他后来很少能够与之媲美的清晰透彻的笔调，总结了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看法和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策略的结论。

毛泽东论证说，农村地主阶级的统治构成了现存反动政治秩序的主要基础。因此，对现在秩序的决定性打击只能由农民去进行，农民站在地主的直接对立面并追求明确的政治目标（不像城市工人，只关心他们生活条件的短期改善）。毛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农村的农民革命），没有第二种形式。”

虽然共产党人甚至在1927年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在城市中仍得到一定的支持，但是，以后共产党同国民党十年内战的主要战场是农村地区。在那里，毛于1928年在江西南部^②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根据地。起初，毛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虽然他时常同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发生争执。后来，他逐渐被架空。他的竞争对手放弃了毛泽东和朱德发展起来的“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而去进行更类似正规阵地战的战争，但是他们后来因为在1934年10月败在蒋介石手下而威信扫地。蒋介石迫使他们放弃了现有的根据地。他们开始向西北长征。其结果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再次取得了对军事的实际控制权。此后，他的领导地位稳步加强，直到1943年他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随着日本的全面侵略，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人自1931年以后已经逐步占领了相当一大部分中国领

① 此文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译者

② 地点应为湘赣边界地区，时间应为1927年。——译者

土。在以后的岁月，毛告诉日本的代表团不要过分地为他们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歉意，因为正是由于日本皇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胜利。虽然应当为毛对矛盾和提出反面论题的嗜好打一些折扣，但在这个说法中有很大的真理。共产党人对农民渴求土地的号召力并不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完全没有影响。但是，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在三个重要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和毛本人作为主要的政治领袖上升到全国和国际的显赫地位布置好了舞台。

第一，日本入侵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同他的对手再一次的联盟，并因此使共产党人得到喘息机会。第二，战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日本人只占据了城市和交通线，因而把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和东北，暴露于游击部队的渗透之下，使共产党人得以在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中建立了基层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第三，这些抗日游击作战的成功，帮助了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爱国的政治力量而赢得支持。1937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记述在中外报刊上的出现，使毛得到机会把自己表现为中国民族斗争最顽强的斗士。

1939年至1940年，毛创造出“新民主主义”一词来表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征。这个概念主要是来自列宁关于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权力，而同时不追求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1905年，列宁提到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总结了他在过去十年内外斗争中所精心设计、而在同国民党重新进行内战的三年中达到顶点的概念，把他将要去建立的政治制度称为“人民民主专政”。

考虑到他所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附属国或半附属国内阶级合作

更大的可能性，他在分享政权的阶级中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还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春天，毛还宣布，中国革命在过去走了一条非正统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在将来要走正统的城市领导和指导乡村的道路。

虽然他因而表明了，他得益于列宁的理论和苏联的榜样，但他从来不打算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早在1936年，他就向埃德加·斯诺宣布：“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当然不是要把它交给莫斯科！”^①正如后来斯大林本人所承认的，毛和他的同志们事实上只是通过坚持进行内战才赢得了全国胜利，而当时苏联人是在敦促他们妥协以避免冒失败的风险，避免对世界和平造成可能的威胁。

尽管如此，如毛后来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是以“从苏联人那里照搬”为基础的。毛和他的同志们有游击战争、动员农村的农民以及在基层进行行政管理的经验。但他们既无管理一个国家的、又无搞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手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从苏联，他们又能从哪里得到鼓舞和支持呢？

这样，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制定的。它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包括一些成套的重工业工厂。但是，不出两年时间，毛就采取了一些步骤，它们最终导致与莫斯

^①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毛主席的回答很长，其中说：“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 G. Wells）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又说：“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没有直接说施拉姆所引的这样的话。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译者

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盟完全破裂。

作为这种倾向的开始，即急剧加速建立农业合作社，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与苏联模式一点也不矛盾。无论如何，强制的集体化恰恰是苏俄的特点。事实上，要害之处与其说是决定本身，倒不如说是毛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他的同志们的方式，和作为其结果的他的个人权威同党的决策机构的作用之间的紧张状态。

1955年7月31日，毛向一次省和地方党的书记的特别会议阐述了关于加速进行合作化的迫切性的思想——会议是专门为这个目的召集的——而不是首先把这些思想提到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决议，但是因此而产生了对执行毛路线的推动力。以至于当10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在领导层中的同事发现，他们是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置于既成事实之前了。

可以论证说，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毛的信念，即迅速建立合作社的好处（在于组织规模的经济实惠和治水方面，也在于有助于国家向农民强征剩余产品方面）大于所冒的风险，是正当的。但是，即便他是对的，这个插曲也坚定他已经有明显表现的信念，即他享有对历史进程独特的洞察力。因而，加速了他从形式上的，如果不是由与他同等的人民主动推举出来的，列宁主义的党的领袖向更传统的模型铸就的专制君主的转变。

毛思想的其他重要的新倾向也在50年代中期出现了。其中，首先一个倾向包含在他1955年7月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论证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社会改造可以走在技术改造的前面。某些看起来成功地不借助任何外来帮助而根本改善了物质条件的合作社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而愈发相信当为革命的目标而动员起来时，中国人民有随心所欲地既改造自然，又改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能力。

第二，甚至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前，毛泽东